

中国哲学史（下）——三松堂全集
第三版第二卷

《三松堂全集》(第三版)出版说明

冯友兰(1895—1990),字芝生,河南省唐河县人,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,后考取公费留美资格,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学习,1924年博士论文出版后,获博士学位。归国后曾执教于中州大学、广东大学和燕京大学。1928年8月起,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,并多年兼任校秘书长、文学院院长、哲学系主任等职;其间曾随清华大学南迁,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。1952年院系调整后,进入北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。

冯友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。他提出的“照着讲”与“接着讲”的方法论,对中国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指导意义。他本人的学术成果,更是在这两个层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。“三史释今古,六书纪贞元”是冯先生对其一生重要著作的总结;冯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两卷本《中国哲学史》是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;主要创作于抗战时期的“贞元六书”则标志其“新理学”体系的确立;1946年至1947年,冯先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,由其英文讲稿整理出版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(*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*),至今仍是世界各地许多高校中国哲学课程使用的教材;“文革”结束后,冯先生已是耄耋之年,在“耳目失其聪明”的情况下,积十年之功,“不依傍别人”,重新撰写了七卷本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,更体现了他作为儒家继承者与发扬者自强不息的精神涵养。冯先生的著作,是了解、学习、研究中国哲学的必读作

品,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及深远的影响。

2012年夏,我们承宗璞先生之托,开始重新搜集、整理、编纂冯先生的全部著述,计划分批出版《三松堂全集》(第三版)。兹就第三版《全集》的工作流程与主要特点作一介绍。

首先,我们以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三松堂全集》(2001年第2版)为基础,参考冯学研究的最新成果,广泛搜罗此前两版《全集》失收的作品;同时,还面向全社会征集冯先生散佚的著作。就辑佚成果而言,第三版《全集》增补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冯先生以英文撰写的学术著作、发表在报刊杂志的短文、写作于建国初期特殊年代的作品,以及此前未曾公开发表的书信等方面。

第二,我们参考蔡仲德先生所撰《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》,广罗异本,梳理冯先生全部著作的版本源流。这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把握冯先生著述全貌,进而做出更合理的分卷安排,另一方面为确定各书、各文的主要对校本提供了重要依据,有利于进一步的文字校正与编辑工作。关于各卷所收著作的版本情况、分卷依据和校勘流程,读者可以参考我们在各卷之前撰写的《本卷编校说明》。至于第三版《全集》统一采用的校勘凡例,则略述如下:

(一)凡工作本与各校本文字有异者,择优、择全而从之。

(二)凡作者早年著述中用字、标点与通行规范不合者,如不影响文意,则从旧本。

(三)凡西文人名、地名、书篇名等专有名词之中文译法与今日通行译法不同者,从旧译;如同一专名在同书、同文内译法不一,则只在同书、同文内保持统一。

(四)凡引文有疑处,如作者注明所引文献版本情况,则复核

该版本;如作者未注明引文版本,或所引版本今不易得,则复核通行本。

(五)第二版《全集》编者所作注释,均以“第二版编者”字样标出;凡第三版《全集》新增注释,则以“本版责编”字样标出,以示区别。

第三,为便于读者使用,我们为各卷分别编制了人名索引和书篇名索引。第三版《全集》最末一卷为总索引。

在《三松堂全集》(第三版)的编辑出版过程中,我们得到了宗璞先生的信任与支持,得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和清华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的鼎力襄赞,得到了冯友兰先生的学生和学界友人及热心读者的大力相助,在此一并致谢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14年1月

本卷编校说明

本卷收入冯友兰先生所著《中国哲学史》(上、下)。

《中国哲学史》上卷(第一篇 上古哲学)写作完成于 1929 年。1931 年 2 月,作为“清华大学丛书”之一,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。书前有冯先生自序一篇,书后附陈寅恪和金岳霖的《审查报告》各一篇,以及瞿世英所作《读冯著〈中国哲学史〉》一篇。

《中国哲学史》下卷写作完成于 1933 年 6 月。1934 年 9 月,下卷连同修订后的上卷一起,作为“大学丛书”之一,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上卷篇名由“上古哲学”改为“子学时代”,下卷篇名为“经学时代”。上、下卷各为一册。是为冯先生两卷本《中国哲学史》初版。该版较神州国光社本,书前增加冯先生新作自序一篇,书后增加陈寅恪为下卷所作《审查报告》一篇。该版此后多次重印。

1944 年 4 月,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。商务 1944 年增订本较 1934 年本,书前新增冯先生专为增订本所作自序一篇;书后附录,在三篇《审查报告》之外,还收录有冯先生所作《原儒墨》、《原儒墨补》、《原名法阴阳道德》、《孟子浩然之气章解》,以及冯先生与张可为合作的《原杂家》共五篇论文。

1947 年,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增订第 8 版。该版在商务 1944 年增订本的基础之上,书后附录补充了一篇署名国立编译馆的《审查意见》。

1961 年 4 月,中华书局根据商务增订本旧纸型重印两卷本《中国哲学史》。书前新增一篇冯先生专为本次重印所作《新序》,

以及《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自我批判》；书后附录与商务 1944 年增订本全同。

1983 年，中华书局又据 1961 年本第二次印刷。这次出版，撤去了冯先生作于特殊年代的《新序》和《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自我批判》，而代之以新撰《新序》一篇。

本次出版《三松堂全集》（第三版），从冯先生著述整体考虑，对《中国哲学史》各版本附件作出以下调整：首先，书前保留冯先生为各版所作三篇《自序》和两篇《新序》；书后附录保留陈寅恪和金岳霖所作三篇《审查报告》，以及署名国立编译馆的《审查意见》。其次，曾作为附录的《原儒墨》、《原儒墨补》、《原名法阴阳道德》和《孟子浩然之气章解》四篇论文，前三篇录自《中国哲学史补》（1936），末一篇后收入《南渡集》（1946），而《中国哲学史补》和《南渡集》本次均单独成卷，故本卷不再重复收录。此外，冯先生与张可为合作的《原杂家》，以及瞿世英所作《读冯著〈中国哲学史〉》，与《中国哲学史补》内各篇文章的写作年代和目的大体相同，所以将这两篇文章也编入《中国哲学史补》。至于中华书局 1961 年本所收冯先生《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自我批判》一文，则编入《三松堂全集闰编》。

本次校勘，以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三松堂全集》（2001 年第二版）本为工作本，以中华书局 1983 年本为对校本，同时参考了《民国丛书》影印的商务增订第 8 版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14 年 1 月

中国哲学史

自序(一)

吾非历史家，此哲学史对于“哲学”方面，较为注重。其在“史”之方面，则似有一点可值提及。

中国近来，史学颇有进步。吾人今日研究中国古代史所持之观点，与前人不同。吾人今日对于中国古代之知识，与前人所知者亦大异。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，吾人今日亦多已加以辨正。对于此种“古史辨”，王船山、崔东壁即已有贡献；不过近人更有意地向此方向努力耳。

吾于写此哲学史时，对于中国古代史，亦往往有自己之见解。积之既久，乃知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，亦不能尽谓为完全错误。官僚查案报告中常有“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”之语。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，近人皆知其多为“查无实据”者。然其同时亦多为“事出有因”，则吾人所须注意者也。

吾亦非海格尔派之哲学家；但此哲学史对于中国古代史所持之观点，若与他观点联合观之，则颇可为海格尔历史哲学之一例

证。海格尔谓历史进化常经“正”、“反”、“合”三阶段。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，“正”也。近人指出前人说法多为“查无实据”，此“反”也。若谓前人说法虽多为“查无实据”，要亦多“事出有因”，此“合”也。顾颉刚先生云：“反”之方面之工作，尚多未做。吾深信之。吾亦非敢妄谓此哲学史中所说之中国古史，即真与事实相合。不过在现在之“古史辨”中，此哲学史，在“史”之方面，似有此一点值提及而已。

此书初稿成后，先在清华印为讲义，分送师友请正。其经改正者，及书中采用师友之说之处，皆随文注明。谨乘此机会，向诸师友致谢。

冯友兰

十九年八月十五日清华园

自序(二)

此书第一篇出版后，胡适之先生以为书中之主要观点系正统派的。今此书第二篇继续出版，其中之主要观点尤为正统派的。此不待别人之言，吾已自觉之。然吾之观点之为正统派的，乃系用批评的态度以得之者。故吾之正统派的观点，乃海格尔所说之“合”，而非其所说之“正”也。

吾作此书，见历史上能为一时之大儒自成派别者，其思想学说大多卓然有所树立，即以现在之眼光观之，亦有不可磨灭者。其不能自成派别者，则大多并无新见，其书仍在，读之可知。于是乃知，至少在此方面言，历史中之“是”与“应该”，颇多相合之处。人类所有之真、善、美，历史多予以相当的地位。其未得相当的地位者，则多其不真真、不真善、不真美者也。吾虽未敢谓此言无例外，然就历史之大势言，则固如此也。

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时，故都正在危急之中。身处其境，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。值此存亡绝续之交，吾人重思吾

先哲之思想，其感觉当如人疾痛时之见父母也。吾先哲之思想，有不必无错误者，然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，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。无论其派别为何，而其言之字里行间，皆有此精神之弥漫，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。“魂兮归来哀江南”；此书能为巫阳之下招欤？是所望也。

第二篇中，采用师友之说及承师友指正之处，仍均随文注明。兹乘此书出版之机会，谨致谢意。

冯友兰

二十二年六月

自序(三)

此书第一篇出版于民国二十年,全书出版于民国二十三年,距今已十余年矣。在此十余年中,吾之思想有甚大改变。假使吾今日重写《中国哲学史》,必与此书,大不相同。然所以不即重写者,一因写历史书必须“无一字无来历”。战时播迁,需用书籍不备。再因近来兴趣,自中国哲学史转至中国哲学及哲学。此三者或多混为一谈,而实则并非一事。因此之故,改弦更张,势所不能。惟全书出版后,陆续写有《原儒墨》、《原儒墨补》及《原名法阴阳道德》三篇,刊入《中国哲学史补》;又与张可为君同写有《原杂家》一篇,此四篇论先秦诸家之起源,可补此书所未备。又写有《孟子养气章解》,了解《孟子》,亦为此书所未及,故并列入附录,以备读者之参考。又吾最近对于中国哲学之了解,见于最近写成之《新原道》(一名《中国哲学之精神》)一书,亦可备读此书者之参考。

冯友兰

三十三年四月

新序(一)

这部书是完全从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,以资产阶级哲学观点,用资产阶级历史学方法所写的中国哲学史。现在把它重印,似乎只有一点理由可说。

北京曲艺中的相声,经常要用两个人说。一个主角从正面发挥主题,一个配角从反面提出辩驳,经过辩驳,主题就可以逐步发展,以达到最后的顶峰。现在各科学领域内,都展开了百家争鸣。这部书的重印,大概可以起从反面提问题的作用。这就是说,在中国哲学史的领域内,这部书可以作一种反面教材。

这部书是作为一个历史材料重印的。既然是作为反面教材,其中的错误,也就不必改了。其中引用背叛祖国的反动分子胡适、傅斯年等的话,也都照原样未加改动。他们的名字,本来是只在作为批判对象的时候,才可以出现于新中国的刊物中的。

这部书的错误是立场、观点和方法上的根本错误。枝枝节节地改,不解决问题。要改就须从根本上全盘地改。这就等于重新

写一部中国哲学史,我是准备这样作的。

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在一日千里,突飞猛进。学术界和艺术界,出现了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的奇景壮观。这样的大好形势以及党的培植和领导使我相信我能完成这样的任务。

我还写了一首诗:

旧书重印愧前贤,腐臭神奇事倒颠。

异卉妙音盈大地,好将新作报春天。

冯友兰

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七日

新序(二)

这部两卷本《中国哲学史》，在中国有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原印本，有解放后中华书局重印本。在书市中，原印本久已绝迹，重印本也不可得见。国内外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，也有不少人是想得到这部书的。为解决这样的供求矛盾，中华书局计划再把这部书加印一批。

在一九六一年，中华书局重印这部书的时候，我写了一篇《新序》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中国社会又起了几次重大变化，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。到现在，那篇《新序》已经不新了，所以要另写一篇《新序》。

历史学是发展的，除了它所讲的历史之外，它本身也有一个历史，这就叫史学史。中国哲学史的研究，也有它的史学史。这部书写作的经过，我在我的回忆录《三松堂自序》中已经讲过了。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一些问题，一种风气和一定的水平。除了它所讲的中国哲学的历史之外，它本身又是中国哲学史的史